

◎创作谈

不断打破认知的界限

罗伟章

故乡是我想象的起点

我的大多数小说，都是从故乡出发的。川东北那片大山大水的土地，是我小说的种子。那里属大巴山余脉。我的老家位于半山腰，开门见山，出门走山，抬头望是云，低头看是河。河叫清溪河，像一根飘带，亮闪闪地依山蜿蜒，顺着河流的方向，目光一直向前，就到了天尽头。山与河，构成了我所认知的世界，也成为我想象的起点。山的那一边是什么样子，河的尽头是否还是河，这是我小时候痴迷的问题。

那时候，山里贫穷，但十分热闹，小小一个村庄，老少少三百多口人，笑的写的，喜的乐的，各种声音，日日不绝。鸡鸣狗吠、猪叫牛哞，丰富着声音的内容，一同编织进春去秋来的生活。我家房子往下，有一棵遮天蔽日的古树，每天黄昏，树上的喧闹声数里可闻，仿佛有千万只麻雀，集结在树上开会，每根枝条上，都密密麻麻挂着它们灰色的身影。树因此变得沉重。有时候，它们吵闹得我们面对面说话都听不清，需要喊。春秋二季，时起狂风，风过处，万物让道。当风停下来，每条土路都被吹白了，连土的颜色都得给风让道。但如果正午时分进入山林，又是那般寂静，光线从树叶间漏下来，能听得见阳光滴落的声音。一只蜜蜂在花丛中盘旋，哪怕有一段距离，也能听见空气的震颤。

这就是我小时候受到的教育。声音给我的教育。是声音教会我辨认村庄和村庄之外的世界。后来，我上了大学，再后来，大学毕业，我在一座中等城市上班，又从那座城市到了省城，但老家是要经常回去的。当我的写作陷入胶着的时候，心情陷入不安和苦闷的时候，一个声音就会对我



人文社跨年盛典——
用微故事定格文学记忆
本报记者 张鹏禹

在每年辞旧迎新之际为海内外读者奉献一场文学盛宴，已成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保留节目。2021年末，一场别开生面的“文学·中国”跨年盛典开风气之先，十余位名家传递文学力量，陪千万读者一道迈入新年；2022年末，跨年盛典以“百位名人迎新阅读”的方式，与千万读者“俯首朝花夕拾，昂头热爱文学”，坦诚拥抱世界，坚定相信未来。不久前举办的“2024文学中国跨年盛典”突破了名家讲、观众听的传统模式，通过“微故事征集令”向全社会发出邀请，通过这个“大舞台”分享自己的文学记忆。这场5小时不间断直播活动全网总观看量超过1200万。

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有和文学不期而遇的时刻。今年的人文社跨年盛典以“爱情和远方”“怀念和遇见”为主线，配以大众耳熟能详的《当你老了》《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斯卡布罗集市》《越过山丘》四首金曲MV，串起数十个朴实却

说：你该回趟老家了。对我而言，那个地图上找不到的村落，是高山灵芝，也是大河的源头。然而，一年接着一年，我听见故乡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微弱，越来越稀少，远离故乡的人偶尔回乡，口音里已带有异乡的腔调，故乡的声音也因此变得越来越复杂。

我告诉自己：应该为声音写一部历史。

一部声音史，可以是一部村庄史，也可以是一部世界史。

这就是创作《声音史》的缘起。写到中途，我觉得还应该写一部《寂静史》。寂静是声音的结束，也是声音的起点。而且，寂静同样是一种声音。但我并没有在完成《声音史》后立即投入《寂静史》的写作，因为在《声音史》中，已出现苟军和桂平昌这对邻居，我在他们身上发现了人性的张力——那是一条触目惊心的裂缝。但凝视那条裂缝不是《声音史》的任务，它有自己的流动的方向，因而我不能停留太久。《声音史》写完，我才着手写苟军和桂平昌，《隐秘史》由此而来。

《寂静史》是《尘世三部曲》（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中最后完成的。那之前，我下派到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有机会深入到那些风景绝佳、未经开发的荒僻之地，体察那里的民众怎样过日子，又怎样梦想日子。潜入最底部生活，暂时离开自己熟悉的环境，许多时候，真可以写作为打开门窗，让光扑面而来。我后来写《谁在敲门》，也缘于在四川西乡县驻扎，那里有一条河，它清亮的色泽、流动的样子，都让我想起故乡的清溪河。我觉得它们是同一条河。天下百川归海，它们有着同样的去向。于是在芦山一家宾馆里，我写下了《谁在敲门》那部六十万字小说的第一句。

每个故事都有自己的使命

《尘世三部曲》由《声音史》《寂静史》《隐秘史》三部小说组成，它们虽是相对独立的故事，承担着各自的使命，但内在联系又是显而易见的。

《声音史》里的杨浪，是千河口村一个普通村民，但他天赋异禀。小说中写到，他有非凡的听觉，能从寂静里听出声音，也能从声音里听出寂静。在村里人外出打工，或迁至城镇后，他固守在祖居的家园，每天到人去屋空的院落和日渐荒芜的田野徘徊，搜集各种声音，存放在心里。他

感人至深的微故事。直播现场舞台上，主持人与现场嘉宾站在微故事讲述区各自分享与家人、朋友、读者有关的文学记忆；屏幕上，天南海北的文学爱好者录制的微视频，分享着自己生命中的文学时刻。场内场外，洋溢着文学给人带来的温暖和感动。

微故事是一种篇幅短、浓缩度高的文学体裁，能聚焦心理变化，捕捉日常灵感。在“爱情和远方”单元，作家东西分享了文学中的爱情。“前段时间我看到一个对临终者的调查，问他们最遗憾的事是什么。可能大家想不到，得不到的爱情是最多的回答。在我阅读的文学作品里，最美的也是没有修成正果的爱情，比如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沈从文的《边城》。”他接着介绍了自己写过的唯一一篇关于唯美爱情的小说《你不知道她有多美》。

因为想念童年北京城南的景色和人物，林海音写下《城南旧事》；因为难忘在东北小城呼兰度过的童年，萧红写下《呼兰河传》。在“怀念和遇见”单元，作家毕飞宇认为，怀念属于精神和灵魂世界，怀念的质量决定了人的质量。作家乔叶则在直播中动情回忆起15岁之前至亲都健在的时光。

直播活动中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大屏幕上广大文学爱好者的真情分享。在人文社发出“微故事征集令”后短短半个月，就收到了许多热心读者发来的微故事视频。他们年龄、身份、地域各异，有学生、军人、医生、作家、教师、演员、学者等。人文社团队根据主题与内容的相关度从读者投稿中选取了一些视频在盛典中播放，其中有求学生活的闪光时刻，有遇到爱情的怦然瞬间，有在文学中抵达远方的奇妙体验，也有对2023年的回顾和怀念……这些来自普通人的质朴讲述触动了现场嘉宾与屏幕前观众的心灵。

不仅能倾听和辨别，还能惟妙惟肖地模仿，那些逝者和远行者的声音，在他嘴里复活，并让整个村庄复活。他坚信，到某一天，离开的会回来，因此，即使数九寒天，他也常常清早起床，去打扫各个院落，还尽其所能，守护着村里的气息和生灵。

林安平是《寂静史》的主人公，作为峡谷里的一名土家祭司，祖传的信仰既是她的精神寄托，也是她的生存根基。特殊的环境和她异乎寻常的出生，使她历经磨难。然而，她从低处的微物和高处的星辰中，领悟宽阔的含义，并由此确立了自己的生命观。随着时代发展，她的职业走向没落，再没有年轻一辈愿意跟随她。那套沿袭千年的祈禳之术，既不起作用，也不被信任。峡谷大开发可能为她带来机遇，但也会形成冲击。她需要选择。

《隐秘史》里的桂平昌，生性懦弱，偏偏与性格暴戾的苟军为邻。后来，苟军离开家乡，久无音讯，并且有传言说他已客死异乡。桂平昌的外在生活和内心生活，都渐次归于平静。然而，山洞里一具无名尸骨的曝光，引起他内心的骚动，也激活了他的潜意识。于是他开始进入自我的世界，认定那具尸骨就是苟军，在想象中完成了对苟军的复仇，却彰显出更为惊心动魄的苍白。

丁帆先生在评论《尘世三部曲》的时候说：《声音史》是心灵史，《寂静史》是信仰史，《隐秘史》是人性史。

探索技法以便更好地表达

许多评论家在论及我的小说创作时，都说到我创作技法的变化。认为我早期的作品比较严格地遵循了现实主义原则，后来有了各种现代技法的融入，到《隐秘史》简直就是魔幻现实主义。其实我自己不这样看。我觉得，我后来的写作，或许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现实主义不是实录，更不是眼见为实，而是一种存在或可能存在。比如《隐秘史》里的桂平昌，刚好遭遇到蛮横的邻居。乡村有“植物特性”，彼此做了邻居，就是长久的邻居。当恶邻离开，他才敢抬头。桂平昌在想象中虚构了一起凶杀案，本是想给自己一个交代，却让自己的内心更加荒凉。对主人公灵魂嬗变和内心潜意识的描写，当然是现实书写，只不过是眼睛看不到的现实，是更深的现实。

包括《声音史》和《寂静史》，



罗伟章近照 作者供图

都是如此。《声音史》特别强化了耳朵的功能。人之五官，视觉相对“肤浅”，肤浅是因为方便，抬眼一望，就看见了，但听觉必须专注，集中意识，调动内心积存的记忆，如此才能辨别声音并将其归类。对这个问题，学者唐诺有过论述。我们通常所说的现实，是眼睛里的现实，而不是耳朵里的现实。然而，在人类文明的早期，耳朵或许更重要，它不仅负责聆听万物之声，还要聆听神灵的启示或告诫。繁体的“聖”字，把耳朵放在顶上，可见听觉在古人眼中的重要性。耳朵里的现实，有时候比眼睛里的现实更深刻。但它们都是现实。包括《寂静史》里的静谧，还有微物之神所创造的自然伟力，同样是现实，只不过往往在人的视野之外。

对创作技法的探索，是作家的天职。探索技法是为了更好地表达。“三部曲”里的小说，写法上很不一样，《声音史》紧贴大地，是心灵史，更确切地说是自然心灵史；《隐秘史》是一个梦魇，内心挖掘是其根本任务；《寂静史》带有原初的气息，是否能有效传达那种气息，至关重要。这几部作品与《谁在敲门》相比，差异就更大了。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不主张写作上的任何界定，评论家可以，他们需要流派或主义去归类、去评论，但作家不必，作家应打破所有界定带来的限制。另一方面，石涛有言，“呕血斗斗，不如啜雪一团”，是说丰富的锤炼再重要，也抵不上心灵的丰富和境界的提升。

（作者系四川省作协副主席）

汕头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举行 多国学者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支招”

本报电（张立童）近日，汕头大学文学院主办的“文献建构、经典解读与路径突破：汕头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该校举行，来自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苏丹依德里斯教育大学等国内外80多所高校及科研机构的120余位学者参加。

开幕式上，日本摄南大学濂户宏教授介绍了21世纪日本的中国现代戏剧研究情况，武汉大学资深教授于可训对会议主题进行了解读，认为“文献建构、经典阐释与路径突破”抓住了当下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主要问题。

在文献发掘与史料考证方面，与会者认为，客观性是史料考证的基础。新旧史料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因此要积极发掘新资料，并在旧资料中发现新问题。与会学者结合自己的研究，分享了史料发掘助力解决宏观文学史问题的经验。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对史料问题进行了辩证思考，他认为，对史料要进行鉴别，稀见史料未必就是珍贵史料，只有与重大问题相关联而又具有填补空白意义的稀见史料才有重大价值。武汉大学教授李

遇春呼吁研究者在关注新文学史料的同时，也要重视中国现代旧体文学的史料建设。上海戏剧学院杨教授分析了新世纪以来史料发掘的几种路径。汕头大学教授程桂婷介绍了新发现的刘以鬯早年三篇实验小说与20世纪30年代文学场的关系。

研究路径的创新与突破是当下文学研究者共同面临的问题。一些与会者提出，要从纯文学领域走向开阔的大文学研究视野，采取跨学科研究方法，建立文化整体观的研究范式，在经典阐释方面，应注意以古释今，综合运用跨文化、跨学科的文本比较及文本细读等方法，对现当代经典文学作品进行重构与重释。

会议期间还举行了《欧阳予倩影印文献全集》（20卷）发布会。这套文集的整理、出版是汕头大学教授李斌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欧阳予倩文献深度发掘整理、研究及数据库建设”的阶段性成果之一。该套文集分为小说、剧本、理论文章、杂文、诗词、书信等类，此外还搜集、收录欧阳予倩后人等所藏的欧阳予倩未刊手稿，文后编制全书索引，是目前国内最全面的欧阳予倩著述辑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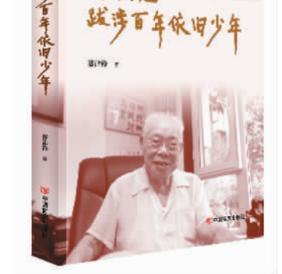
《欧阳予倩影印文献全集》（20卷） 主办方供图

2021年7月1日上午，在观看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后，一位老人写下这样一段话：“我是马识途，我今年已经进入107岁，我是1938年入的党，我在入党誓词所许诺的义务和责任已经实现了，我无愧亦无悔。”这被慕津锋记录在《马识途：跋涉百年依旧少年》（中国言实出版社）一书中。作为一位百岁老人，一位经历了20世纪中国风云变幻的历史，参与了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斗争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老党员，他的这段表白无疑构成了一代知识分子和革命者的心声。他们为党和人民不懈奋斗的精神，无疑是我们宝贵的财富和重要的思想资源。

1931年，16岁的马识途在日记中写下“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正是马识途的人生写照，他的求索和奋斗，他的百折不挠、奋斗不止，无疑具有激励后人奋进的巨大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慕津锋的传记文学《马识途：跋涉百年依旧少年》具有多重意义。它既是一部关于马识途的个人传记，也是一部从个人角度书写20世纪历史的非虚构作品，因为历史恰恰是个人传记的合成。

为了更好地呈现人物，在写作方式上，本书非常注重材料的选择和剪裁。一方面，注意选取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着重书写，以便集中呈现马识途参与的革命历程以及他的思想和精神状况。比如书中根据马识途的革命经历，按照时间和空间线索，选取他在北平、上海、南京、恩施、昆明、成都等地的活动，尤其是那些他参与的重要历史事件，勾勒出马识途人生经历的阶段性特征，以及这一过程中的思想和意识变化。比如，思想上由工业救国转向革命救国，加入中国共产党，等等。另一方面，作者也注意选择那些更具日常化、个人化的资料，从日常生活细节进一步补充和完善马识途的人格与形象。在呈现历史厚重的同时，增加文本的丰富性和生动性。传记作家塞缪尔·约翰逊曾说：“传记作家的职责往往是稍稍撇开那些带来世俗伟大的功业和事变，去关注家庭的私生活，展现日常生活琐事，在这儿，外在的附着物被抛开了，人们只以勤谨和德行互较短长。”因此本书既是20世纪革命史的缩影，也作为“心灵的证据”，真正深入到马识途的内心和精神领域，在塑造革命者、革命作家、知识分子马识途的同时，也塑造出他生活智者和慈祥老人的形象。

材料选取背后是对马识途基本



还原杜甫生活的历史时空 ——读彭志强《秋风长啸：杜甫传》

张志烈

杜诗注本《杜臆》作者王嗣奭评价杜甫对生活、对诗歌的态度是“并力一向，以全副精神注之”。读了彭志强的《秋风长啸：杜甫传》，我亦有同感。他研究杜甫十多年的刻苦努力，也可以说得上是“并力一向，以全副精神注之”。

为杜甫作传，不能不知人论世。彭志强这本著述的根本追求，就是通过生动还原杜甫生活的具体历史时空来理解杜甫的思想精神。为此，他驾车追踪杜甫的足迹，车中放着《杜甫传》和《杜诗全集（今注本）》。他在本书跋文《朝圣记》中说：“我更想去洛州的巩县为新的起点，从杜甫诞生窑出发，沿着公元712年至770年这个时间线，一步一步去丈量杜甫一生的足迹，一段路一段路去感知因为杜甫诗歌而肥沃的土地，然后厘清杜甫潜伏在每个时空节点的悲欢，注解他激荡或者沉郁在诗句深处的儒释道思想。”读完这本书后，我觉得他的目标实现了。

本书第三章《奉先寺》中，作者多处谈到杜甫的思想，如说“现存的一千四百五十五首杜甫诗歌，至少有超过五十首表现了他的佛学思想”，又说“不可否认，杜甫的

一部革命者的精神传记 ——读《马识途：跋涉百年依旧少年》 王秀涛

形象的确认，因此在丰富的细节背后依然可以看到人物的突出特征。从书中内容看，马识途被定位为一位革命者，也是一位革命作家。马识途的革命经历和写作是无法分开的，革命构成他的人生基调。正如他在《我怎样写起小说来的？》一文中所说，他时时刻刻所面对的是生与死的搏斗，血与火的战争，他为胜利欢歌，为失败痛苦，为敌人疯狂的镇压而切齿痛恨，为战友惨烈的牺牲而放声痛哭。这些人物和事件沉落到记忆的底层，逐渐成为思想的矿藏。《清江壮歌》是马识途最具代表性的长篇小说，正是革命的经历促使马识途拿起笔来，“与其说是我写的长篇，还不如说是烈士们用鲜血书写的”。乔治·桑兹伯里认为，一个真正的传记作家“不应该满足于仅仅展示材料”“他应该把所有这些材料在头脑里过滤，然后再呈现于我们面前，不是让我们只看见树木，而是让我们看到一幅完整的画，一件作品。”本书在这方面无疑非常出色，绝大多数细节和素材都围绕着为革命者和革命作家立传的基本主题，在大历史与个人、大事件与日常生活的互动中较为完整地呈现了马识途人生历程的主调和主线。

对马识途形象的准确把握，很大程度上缘于作者的“知人论世”。慕津锋供职于中国现代文学馆，长期从事作家文物的征集工作，和马识途相识多年，堪称忘年交。他参与了马老的很多文学活动，这种近距离的接触、观察和在日常生活中的频繁交往，不仅使作者得以熟悉马识途的人生经历，更让他从直接交往中感受到马老的睿智幽默等性格特质。因此在书中的很多章节里，作者填充进大量鲜为人知的细节，令读者印象深刻。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并没有因为和马识途亦师亦友的关系而夸大其词，而是始终秉持客观原则，为我们还原出真实的人物形象。这是传记写作的基本要求，也体现了本书求真务实的基本精神。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主要思想肯定是儒家思想，其核心是孟子的仁政思想，所以我对杜甫头脑里拥有儒释道三家思想也有主次之分，首为大儒，中为佛学，小为道学”，还说“杜甫本身也是杂家，杂取各家的大儒、中佛、小道于一身”。

彭志强“大儒、中佛、小道”的论述，是他实事求是、细致分析而得出的结论。唐朝人早就有儒学治国、佛学治心、道学治身的说法。《杜诗镜铨》卷十八《忆昔行》后，杨伦评云：“太白好学仙，乐天专学佛，昌黎仙佛俱不学，子美则学佛兼欲学仙，要亦郁郁无聊，姑发为出世之想而已。”这里大小中之论，与前贤的认知是可以相通的。

通过此书，读者可以看到杜甫如何走完“读万卷书，万里作客，潦倒多病”的一生，如何践行“致君尧舜上”“诗是吾家事”这两大人生梦想，如何勇于开创“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唐代诗歌新天地，如何从一个官宦子弟成长为心系苍生、胸怀天下的大唐诗圣。

（作者系四川省杜甫学会会长、《杜甫研究学刊》主编、四川大学教授）